

漢書



文库

汉书

上册

十二月

月一

月一

三月二

标 点 陈焕良

曾宪礼

责任编辑 李润英

封面设计 许康铭

汉 书(上册)

〔汉〕班固 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3年5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5次印刷

字数：710,000 印张：32.625 印数：38,201—48,200

ISBN 7—80520—376—8/K·84

定价：(平) 21.50元 (精) 25.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邮编：410006)

出版说明

《汉书》问世近二千年，历代流传的版本很多，但迄今较为通行的，则要推景祐本（《四部丛刊》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北宋景祐本）~~和汲古阁刊本~~、晋汲古阁刊本）、殿本（《四部备要》所收清乾隆间武英殿刊本）、王本（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本）~~和中华书局1963年版繁体、直排、标点本~~这五种，其中以中华标点本在读者中影响较大。

岳麓书社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的《汉书》（简称岳麓本），是以景祐本为底本，参校上述诸本整理而成的简体字排印本，分上、下两册印行。

岳麓本之所以选景祐本为底本，以后出诸通行本为参校本，主要是考虑到景祐本有近古存真的特点：后出诸本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误文，是景祐本所没有的；后出诸本有不少隐而不显的误文，景祐本则较少。景祐本虽亦难免有讹夺倒衍之文，但这类误文大多亦存在他本之中，仅有少数属景祐本独误。我们相信，只要能广泛而审慎地吸收诸家考证、校勘的成果，完全可以依靠诸本互校，将景祐本的误文勘正到低于后出诸本的程度。

本书的校勘，主要是利用不同版本来比较异文，择善而从，其中也慎重地吸收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现就本书在校点工作中的有关具体问题，作如下说明：

(1). 凡底本与参校本不同，而又以底本为是者，则径从底本，不出校记。

(2). 凡以参校本或其他材料（如诸家考订成果、出土文物新证等）为依据而改底本时，用小一号的字体加（ ）标出底本中应删改的文字，随后用〔 〕标示所增补或校正的文字。凡增删改乙之处，均在附于下册书末的校记中，简要说明校改的根据。

(3). 一般情况下，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异体字一律改为正体字，但部分专名异字，则仍保留，以免歧义。

(4). 古体字和通假字，一般不改为本字。但为了方便读者，同时减少刻字之烦，则将某些较生僻的古字，径改为今字；而某些通假字，只要有参校诸本用本字者，亦据以径改为本字。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特将未改动的古字、通假字摘录若干，并将其相应的今字、本字附注于括号内：

禽(擒)	章(彰)	跳(逃)	豪(毫)	罢(疲)	什(十)
桀(杰)	畴(俦)	畔(叛)	僂(戮)	骖(委)	竟(境)
伯(霸)	仄(侧)	昏(婚)	历(析)	颞(专)	常(尝)
姓(生)	向(响)	爵(雀)	风(讽)	县(悬)	景(影)
蚤(早)	媼(侮)	盪(戾)	冯(凭)	涂(途)	离(罹)
廷(庭)	填(镇)	密(谧)	欧(殴)	徼(邀)	女(汝)
鼂(朝)	知(智)	织(帙)	嫫(讪)	嫌(嫌)	徇(殉)
沈(沉)	然(燃)	濯(棹)	底(砥)	错(措)	虚(墟)
领(岭)	寓(宇)	娄(屡)	说(悦)	说(税)	廛(仅)
廛(勤)	队(坠)	队(隧)	髦(牦)	髦(旄)	亡(无)

亡(忘) 才(材) 财(才、材、裁) 乡(向) 辟(避)

乡(响、享、飨) 见(现) 適(嫡) 振(赈) 很(狠)

(5).底本中,同一人名或地名,往往有不同写法,本书正文不求一律。在下册末所附《人名索引》中,已将不同写法、不同称谓的同一人名,分别归并于其主目后的括号内,以便读者检索。

最后,需要坦诚向读者说明的是:《汉书》这部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在千百年来的传写、刻印、流传过程中,积误颇多。虽经历代学人考订、校勘,而留存至今的某些文字、标点上的疑难问题,仍非一时所能断然解决。总之,我们只希望在前人辛勤劳作的基础上,尽可能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一个便于阅读与研究,并便于收藏的《汉书》读本。但是,限于校点者和编辑者的水平,岳麓本《汉书》仍难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一九九一年四月

前 言

陶懋炳

我国史学名著中，《汉书》仅次于《史记》。岳麓书社将《汉书》详加校勘整理，纳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出版，对于广大读者发掘《汉书》精华，推陈出新，振兴我国史学，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应当说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

汉武盛世而有司马迁著《史记》，东汉光武、明、章之治后又有班固作《汉书》。这是饶有趣味的重大历史事件。当然，两部史学名著的出现并非偶合，两个“盛世”也绝非简单的重复。

汉武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由胜利而确立、巩固的标志，当时，国内实现了空前的、巩固的大统一，封建制度支配地位的完全确立，封建经济出现了第一次繁荣盛况，这一切，都是东汉初不能比拟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东汉初对西汉后期的种种调整、变革、强化。如世家地主的兴盛，独崇儒术局面的完成，等等。不同的时代，产生自己的文化代表人物和他们代表时代的巨著。司马迁著《史记》和班固著《汉书》，恰是

如此。

班固的家族与司马迁迥异。据班固《汉书·叙传》自称，班氏本楚贵族后裔，楚亡迁于晋、代间。自其七世祖起，逐代上升：由边地豪富而致位郡县，至曾祖班况而以大臣名家占籍长安，姻娅皇室；至其祖父一代，有通经术、致位二千石、入居侍中者，有承赐秘书之副者。时人称其家“倾动前朝，薰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直至两汉之际，其父班彪虽未登显要，却还是“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雄）以下莫不造门”^①，他成为当时一位有重名的正宗经学家。东汉初建之际，班彪先后奔天水、河西，依隗嚣、窦融，窦融举河西归汉，班彪实与其事，而两家从此荣枯休戚，息息相关。

班固（公元32-92年），班彪子。承父经术史学，少负重名。明帝时除兰台令史，迁郎官，典校秘书。章帝时，更受赏识，“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至渥”^②。章帝建初四年（79年）会诸儒讲论五经于白虎观，作《白虎通德论》（即《白虎通论》），令班固撰集其事，成为白虎观经义的主编。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融孙大将军窦宪伐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大破匈奴，追逐金微山，班固撰《燕然石铭》，闻名后世，至今仍被珍存。永元四年（92年）窦宪因罪诛。班固为

① 《汉书·序传》

② 《后汉书·班固传》

其亲信幕僚，受了自家豪富外戚习气的影响，“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①甚至其家奴都敢干洛阳令种兢车骑，乘醉冒骂。至是，种兢借机罗织，班固死于狱中。

虽然班固不得其死，但班氏家族却没有因之降低其声望地位，班固所撰《汉书》仍为皇家赞赏，组织人力，完成全书。原来自《史记》成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鄙俗浅陋之徒，不足以继成，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未成，班彪病歿。班固居父丧，整理《后传》，欲竟父业，为人告发，坐私改国史罪下京兆狱，书稿尽没入官。其弟班超为之申诉，明帝阅书稿，甚为嘉赏，释放班固，归还书稿，召任职兰台，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业，班固遂改通史体为断代，表明他旨在为汉家颂扬功德，断代为史，把汉朝地位凌驾秦上。于是，甚为皇家赞赏，跟司马迁撰《史记》的命运完全不同。班固死，其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犹未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其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助手，始完成全书。所以清人赵翼指出，《汉书》之成，历时二十五年，由四人完成。《汉书》之成，多由朝廷支持、组织，故它的命运远胜《史记》。

(二)

班固不足与“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比高攀大，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后继者往往能为前人拾遗补阙，甚或完善前人所创事物，立不可磨灭之功。《汉书》之与《史记》，正是如此。

① 《后汉书·班固传》

《汉书》最足称者，在于其对编纂方面的贡献。班固撰《汉书》，开创了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将《史记》开创的纪传表志体裁进一步完备起来，成后世正史不祧之宗。《汉书》本身称书，乃改《史记》所立的“书”为志。又因汉代异乎春秋战国，大一统之局，何有列国可言，乃废世家，并入列传。《汉书》所载，始于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历史。全书本百篇，后人分为120卷。十二帝纪为西汉历代皇帝编年大事记。八表中有“古今人物表”与体例不合，最为后世訾议。十志有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内容不限汉代，堪称由三代至汉的典章制度、经济、文化史，适足以补《史记》之不足。

班固撰《汉书》，体例胜于《史记》。这些体例在当时有其道理，对后世很有用处。如：《汉书》废《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目的在突出正统思想，为汉家辩护。但是，我们且不论《项羽本纪》，《吕后本纪》之废，还是有点道理的，她并没有践祚称帝呀！这就是汉代儒家的《春秋》之义，可以说是“无秩序中的秩序”。又如，把各种列传的称呼、次序理顺，较《史记》为清晰。《八表》、《十志》影响后世，这里就不说了。

《汉书》以博洽见称，除体例之外，又体现在搜集资料丰富、选用适当。如：（1）《汉书》较《史记》后出，故能得到前人未尝闻见的资料，其边疆族列传和外国传，较《史记》内容大增，有的是新开撰的。（2）《史记》好奇，《汉书》务实，故《汉书》多用对策论政之文，如《贾谊传》不载其赋而载《治安策》，《晁错传》

载其募民徙塞下等疏奏等。清人赵翼称,“《汉书》多有用之文”,确是中肯之论。(3)《汉书》后出,资料远胜前人,又兼收诸家成果,故能对《史记》作一些甚有价值的订正:《史记》未载因嘲笑项羽“沐猴而冠”被烹杀的说士姓名,《汉书》考订为韩生。《史记·李将军传》云,李陵降匈奴,汉闻匈奴以女妻之,遂族其老母妻子;《汉书》则载明:汉闻李陵教匈奴为兵,遂族其母妻子,后查明,教兵者乃李绪,与李陵无干。似此之类的订正,尚有多处,甚有裨益于学者。

班固承家学,成为当时经学家中的巨擘,他标榜其父“唯圣入之道然后尽心”,因而,在当时或后来的一些朝代,在经义方面诘难《汉书》者不多见,只是唐宋以后,情况才有变化。《汉书》多古字古义,这是难度较大的学问,在撰写过程中,女史学家(也是经学家)班昭受命完成其兄未竟之业,就对她的助手、弟子马融兄弟面授。后来,东汉有服虔、应劭注解《汉书》,各为音义,魏晋而降,此类注解更多,至于唐初,颜师古(581—645)作注,征引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颜师古总结前代成果,其功甚巨。宋以后注《汉书》者,以近代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最为人称道。稍后,杨树达先生撰《汉书窥管》,把《汉书》注解引到了一个科学的新境界。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不读《史记》不行,不读《汉书》也不行。这不是虚声恫吓,不读这两部巨著,毫无中国文史素养,不识字,不通掌故,甚至连成语都一窍不通,贻笑大方,而曰“弘扬民族文化”,岂非“我谁欺?欺人乎?欺天乎?”

《史记》的文学价值,可说中外并颂,久而弥高。就是在我

国古代，文学家们也是称颂不已的：宋代文学家苏轼称司马迁“文章多奇气”，这是人所共知的。明末清初罹祸惨死的文学家金圣叹称《史记》为“第一才子书”。至于《汉书》的文学价值，却很少有人议论。然则，《汉书》只有语言学的价值，少有文学价值吗？不然。《汉书》写人、写事，颇具匠心，细腻深刻，引入深思：

《汉书·霍光传》，记了一件为人们所忽视的小事：“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窃识之，不失尺守。其资性端正如此。”

妙得很！把霍光那副形象写得入木三分。其他如《赵广汉传》写其苛察、残酷、希指伺意、专横跋扈，如见其人。《张禹传》写其贫恋富贵、趋炎附势，为王氏效劳的卑劣面貌，令人读后欲唾其面、批其颊而后快。如果说写这些人难度不算大，那么，班固在《李广苏建列传》中写李陵、苏武，确实用了很多心血：关于李陵，传中叙他与数十倍于己的匈奴骑兵殊死苦战，录引司马迁为之申辩的言词，字里行间渗透了对李陵的深切同情和惋惜。他在记昭帝遣使匈奴，欲招李陵归汉时，李陵默然不语，“孰（熟）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又对使者说：“…归易耳，恐再辱奈何！”笔墨不多，实为神韵之笔！至于写苏武饥食旃毛、渴饮冰雪的爱国者高大形象，较诸写李陵，却又容易多了。

不读《史记》，不识司马迁之奇才卓见。不读《汉书》，不知班固之博洽。学问之道最忌一偏之见，兼收《史》、《汉》之长，乃古今治史有成者的通衢，不可忽也。

(三)

我们说上段末的这段话，绝不是不论是非、不别黑白地兼收并容；而是要在明白是非，辨识精华、糟粕的前提下，善于抉择，广事吸收，作实事求是的探讨。

著名学者扬雄曾在称赞《史记》为实录的同时，指斥太史公“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班彪则说：“……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传》）班固评司马迁，全是承父之说。但此议一出，后代史家不满者越来越多，驳议者逐朝有增，有的史家颇有卓识者，如南宋郑樵在这方面就过了头：他呵骂班固专事剽窃，全无学术；他认为班固与司马迁相比，不啻猪与龙相比，乃至就其结局讥贬，成了人身攻击。其他诸家言论，各有毁誉，也有某些合理处，但就整个来说，他们的言论有的并非重要问题，有的则并无意义，一句话，没有触及要害和根本。“五四”以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评议马、班，颇有成就。目前，可能又出现一场新的争鸣。这些，我们暂不多说，拭目以待。

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乃是汉代儒家的特点，无论西汉的司马迁或者东汉的班固，都不能脱此道。然而，如将他们等量齐观，于各自对祖国文化史（尤其是史学史）所起到的作用和贡献不加区别，则也是不当的。

处在“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汉武帝时代，虽然形势严峻，但法网还不那么周密，加上当时百家争鸣的余烈尚存，即使儒家诸派也还争论炽烈。所以，司马迁一面信仰五德终始、天人感应，一面却怀疑天命神意，并且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卓见，终成一家之言，不但垂之不朽，而且久而弥高。班固处在儒学统治地位已固的时代，尤其是宣帝、章帝两次讲经，光武帝奖图谶，文网周密，远逾西京，作为正宗经学的泰斗，班固撰史，当然要“惟圣人之意尽心”了。他承袭了前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以此来论述西汉一代历史。他反对《史记》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而强调“汉绍尧运，以成帝业”，遂断代为史，将汉朝凌驾秦朝之上。由于他将秦、新（王莽）两朝置于“闰位”，从此，正闰之争便开始了。读者或许要问，《史记·汉高纪》中不是有刘邦斩白蛇、乃赤帝子之说吗？那么，汉承尧运，以火德王之说，不是司马迁开始吗？不然，此乃西汉元、成而后，续写《史记》或改写者窜入，嫌疑最大者是班彪，请参阅拙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略》115页。《汉书》多方宣传神秘论，用以神化封建专制皇权；《汉书·艺文志》以九家之源皆出官府，实际上旨在为汉朝垄断学术、罢黜百家立论；至于其论货殖，斥游侠，与《史记》截然不同，其坚持愚民、坚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更是明显的。不承认这些，岂能区别精华与糟粕？

我们指出班固和《汉书》的这些缺陷，并不认为班固和司马迁是势不两立的学派。他们都是汉朝的士大夫，都立志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宇内一统、亘古仅见的大汉天朝纪颂功德，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处于自然科学贫乏、分割闭塞的中世纪，他们处在各自不同的处境中，思想往往自相矛盾。诸如此类的共同处，不一而足，不可忽视。

与欺世媚主之徒迥异，班固这位正宗史家，虽以说教为职事，但并不徒事空言，专尚谀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但可以成为信史，而且颇多中肯之论，故能垂之后世，成为史学名著。

《汉书》宣扬天命，比较集中在《高祖纪》和《王莽传》。

其论高帝，“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这当然是论人事而非言天命，而在《赞》中，除了为刘氏编排为唐尧之后的大系外，便是这几句称说天命的话：“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对开国之主称颂天命，而嗣君后代，则又是另一个调子了。《汉书》论史之可贵处，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试举数则以明之：

《惠纪》：“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立论中肯，又有分寸。如果说《惠纪》还不足见班固的识见，则《文纪》、《景纪》、《武纪》、《宣纪》各有精到之处：

《文纪》踵效司马迁记遗闻轶事之有特殊史料价值者，然后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景纪》：“……周秦之敝，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信矣！”

这些论赞确实承继了《史记》的优良传统，而在《武纪》中云：“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显得冷静、公正，实为可贵。

至于叙论孝宣，对他以平民身分得重回皇家、继祚为帝，写了一些委曲情况，其中主要是表明他是天命所归者，而在《赞》中则完全汰除了这些，一则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再则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然后说：“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应当说，这也是一篇佳论。

作为正宗史家，班固撰史，既要宣扬天命，又不能把一切尽归之天命，而把人完全视为天意支配下的玩偶。在汉朝，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尚处在青春时期，班固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势力，还是颇有生气的，故其气派也自与后世（尤其是尾间）不同了。

笔者识浅，兼以病榻命笔，谬误必多，尚祈多方教正，幸甚幸甚。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

汉书上册目录

卷一上

高帝纪第一上……………(1)

卷一下

高帝纪第一下……………(17)

卷二

惠帝纪第二……………(30)

卷三

高后纪第三……………(33)

卷四

文帝纪第四……………(37)

卷五

景帝纪第五……………(50)

卷六

武帝纪第六……………(57)

卷七

昭帝纪第七……………(80)

卷八

宣帝纪第八……………(87)

卷九

元帝纪第九……………(104)

卷十

成帝纪第十……………(114)

卷十一

哀帝纪第十一……………(128)

卷十二

平帝纪第十二……………(134)

卷十三

异姓诸侯王表

第一……………(140)

卷十四

诸侯王表第二……………(153)

卷十五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170)

卷十五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197)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第四……………(223)

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第五……………(279)

卷十八

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299)